

# 忘掉过去就会重蹈覆辙

## ——叶永烈谈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

文\海南日报记者 魏如松 蔡葩 实习生 黄智

### 作家访谈

叶永烈是中国著名传记文学作家,也是一位冬季来海南写作的“候鸟”。椰风海韵的陪伴,让这位高产的作家可以脱离人际的喧嚣,静下心来写作。日前,叶永烈所著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,记者在他海南的家中聆听该书创作中的故事。

**海南周刊:**有关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历史,是中国当代史研究工作中一片荆棘丛生的处女地,是什么原因让您对这段历史特别关注?

**叶永烈:**“文化大革命”作为一场悲剧、闹剧、惨剧,早已降下大幕。1980 年 9 月 26 日,“文革”集团的十名主犯被押上审判台。那些日子,我坐在荧光屏前,收看那举世瞩目的历史审判,发觉审判中揭露出大量惊心动魄的事实,比任何虚构小说都更具有震慑力!于是萌发了写作反映“文革”的长篇纪实文学的念头……

巴金《随想录》和美国威廉·夏伊勒的长卷《第三帝国的兴亡——纳粹德国史》都给我动手创作以思想上的启发:“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”。我希望通过写作,深刻揭露“四人帮”兴亡史,批判“极左”思潮,防止“文革”卷土重来。

**海南周刊:**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是一部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重要作品,您作此选题背后有什么样的故事?

**叶永烈:**20 世纪 80 年代初,我开始着手写作以上海“文革”十年为内容的《上海的拼

搏》,但在采写过程中发现这样写具有局限性,因为《上海的拼搏》只限于上海的“文革”,而上海的“文革”听命于北京。然后就将《上海的拼搏》扩大为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。后来由于题材太大,遂把“母题”分切成四个“子题”,即分成王、张、江、姚四部传记来写。

**海南周刊:**纪实小说的创作要求史实准确、立论正确。您在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,最深的体会是什么?

**叶永烈:**这本书的写作,时间跨度很长,给我最深的体会就是写作中“禁区”多,采访难。首先,“禁区”多。“文革”档案是“禁区”。为了穿越这个“禁区”,我多方奔走,办了许多繁杂的手续。

其次,采访难。采访中,最困难的是“文革”中的风云人物。我进入过监狱、劳动工厂采访,不仅手续繁杂,而且办好手续后,这些人物都有很深的戒备心理,都是疑虑重重,不问不答,不愿录音,更不同意拍照。

尤其是对陈伯达采访,那是经历了很曲折的过程的。陈伯达身份特殊,他曾是中国的第四号人物,国家对他的人身保护是很严密的,不允许人随便打搅。更困难的是陈伯达本人不愿接受采访,更不愿谈及那不堪的往事。

我在去北京采访陈伯达前,充分做足了功课,研读陈伯达专案的相关材料和陈伯达的著作。到北京后并不直接采访陈伯达本人,而是打起“外围战”,即采访陈伯达的警卫员、亲人朋友等了解更详细的内容,包括他的性格喜好等。在采访时,尊重被采访者,摆正采访意图。还有,注意采访技巧,寻找询问的切入点,把握现场气氛。比如开始时,我对陈伯

达说:“陈老,我早在 1958 年就见过你!”“哦,1958 年,在什么地方?”“北京大学。当时,你带来了一个‘翻译’,把你的闽南话译成普通话。我平生还是头一回遇上中国人向中国人作报告,要带‘翻译’!”陈伯达听后,哈哈大笑。顿时,原本尴尬的采访气氛一下轻松起来。接下来的采访顺利很多。

**海南周刊:**您写“四人帮”,“死材料”得来尚且不容易,从当事人采访到第一手信息更难。之所以能够开展这一“工程”,主要得益于什么?

**叶永烈:**当时上海市委宣传部给了我很大支持。上海作协要我写报告,报告写了好几次,开列采访名单,这个名单大概有 100 多人吧,包括要求查阅哪些范围档案、资料。之后,上海市委宣传部就在报告上盖章,我就凭这份介绍信去采访。一些重要单位连介绍信也不管用。后来基本就没有凭任何介绍信了,我去北京都是住公安部的招待所,公安部给我提供了很多便利。

**海南周刊:**写作这本书,您采访了很多,普通老百姓对“四人帮”最一致的评价是怎样的?

**叶永烈:**老百姓没有一个对“四人帮”表示好感的,只有今天一些不懂事、叛逆的小青年才会胡说八道。我在网上就看到有些年轻人呼“江青是杰出的女性”,“姚老,您走好!”,殊不知只要他们仍在台上,我们还得生活在水深火热中。而亲历过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,他们推行的那一套极“左”的思想路线对中国造成了多严重的危害。

# 江青在毛泽东弥留之际的表现

### 精品书摘

毛泽东的生命列车,已经驶近他的终点站。

9 月上旬,毛泽东已处于弥留状态。争夺中国最高领导权的斗争,已经进入了最激烈的阶段。

9 月 2 日,“小兄弟”陈阿大来到北京,王洪文马上“接见”。陈阿大一回到上海,便传达了北京最新消息:“中央两条路线斗争非常激烈。这是党内的第十一次路线斗争。江青同志、春桥同志、文元同志、洪文同志是正确路线的代表。只有紧跟他们,才可能在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中不犯错误!”

9 月 8 日,江青来到北京新华印刷厂,请工人们吃文冠果。这种壁厚的果子并不可口,江青却大讲其中的典故:“你们知道吗?文冠果的另一个名字叫文官果,象征着‘文官夺权’!”

江青的话,透露了四个“文官”——王、张、江、姚的心声。

江青并没有参加值班。但是,在毛泽东病重的日子,她不住钓鱼台,住中南海。她在中南海的住处,就在毛泽东住处旁边。

9 月 8 日,毛泽东的病情已经处于非常危急之中。

据毛泽东医疗组李志绥、陶寿淇、吴洁、陶桓乐、周光裕、方圻、王新德、翟树职、潘屏南、朱水寿、薛世文等在 1976 年 10 月 14 日所写的材料,这样记述当时的情景:

9 月 8 日,江青一定要主席翻身,医护人员坚决说不能翻,翻了危险。江青硬给主席翻身,结果翻身后主席颜面青紫,血压上升,江青看情况不好,扬长而去。

8 日晚我们在抢救过程中,大家分头紧张工作,江青进来大吼“不值勤的都出去”,我们没有听她的。

在毛主席病重的时候,江青拉毛主席医

疗组的医生给她查身体。她还要把主席正在用的心电图示波监护器拿去她自己用,我们没有同意。去天津小靳庄时,不顾主席病重,还要医疗组一些医生陪她去,我们坚决不同意才作罢。

主席生前,江青对医护人员横加指责,经常谩骂“医生是资产阶级的,护士是修正主义的”,干扰治疗。主席逝世之后,我们都很悲痛,江青却说:“你们不能愁眉苦脸啦,看我现在就很高兴。”

毛泽东医疗组的这一揭发材料,载入中共中央《王洪文、张春桥、江青、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(材料之一)》。

9 月 8 日下午 6 时多——离毛泽东去世只有 5 个多小时,江青却心血来潮,突然跑到北京新华印刷厂。

江青怎么会忽然跑到新华印刷厂呢?据说,江青获得“情报”:有“特务”在那里搞她的“情报”,搞中共中央的“情报”!

江青所说的“特务”,并不是国民党特务,而是“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的高级特务”!

到新华印刷厂搞什么情报呢?这是因为当时中央领导人的一些讲话稿,在新华印刷厂排印。

江青突然跑到新华印刷厂,为的是在那里“查特务”!

据新华印刷厂连秀荣、韩致仁、李同彦、赵家玉、伊淑珍、姜信之、张世忠、葛运通、罗孟琦等九人在 1976 年 10 月 30 日所写的材料说:

江青事先没有通知,突然来厂。江青一来直奔防震棚(引者注:在唐山地震之后,当时北京普遍搭建防震棚)。

当时棚里没有人等候。连秀荣同志赶来时,江对连发脾气。江说:“我就请了一个小时假,你知道我从哪里来吗?我从大寨来。”

当迟群、谢静宜来了以后,江急着问迟群:“你给我带来材料没有?”江青拿过材料批

划。江与迟、谢三人低语一阵子。

后来,江突然问:“小谢,我问你的问题,你为什么都不答,你知道吗?党内最大的走资派派来高级特务,监视我,搞我的情报。”

又说:“工人同志们要擦亮眼睛,提高警惕,谁是特务,站出来,自首,保护自首的。”

又问迟、谢说:“你别急,会弄清楚的。”

江又说:“我怕什么,我什么都不怕。”这时候,毛泽东已经处于生命的最后时刻。

守在毛泽东床前的是张玉凤。

医生们忙于抢救垂死的毛泽东。

江青从新华印刷厂回来后,曾在毛泽东床前守候,夜深离去。

9 月 8 日子夜,毛泽东气息微弱。

当 9 月 9 日零时刚过,才十分钟,毛泽东停止了呼吸。

张玉凤奔出毛泽东卧室,疾步走向毛泽东书房,向守候在那里的华国锋、王洪文、张春桥、姚文元、汪东兴报告噩耗。

住处不过一箭之遥的江青,迅速得到报告,马上奔了过来。

后来,姚文元曾这样描述他在现场所见:

她头发散乱,神色慌张,进门便扑在主席遗体上一面痛哭,一面呼喊:“医生呵!你们快救救主席呵!你们为什么不救救他呀!”

她嗓子都哭哑了,仍不肯离去。其悲痛之状,催人泪下。

姚文元所述,应当是真实的。不管怎么说,江青跟毛泽东从 1938 年结合,到 1976 年,毕竟有着三十八年的夫妻感情。

毛泽东是在 1976 年 9 月 9 日凌晨零时十分离世。他,终年八十三岁。自 1935 年遵义会议确立了他在中共的领袖地位以来,至 1976 年,长达四十一年。

摘自叶永烈纪实长篇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,人民日报出版社,2009 年 1 月

著名作家叶永烈,花费二十多个春秋,经过广泛采访,完成的 180 万字纪实长篇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,近日由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。该书是一部关于“四人帮”的纪实长篇,是关于“文化大革命”的重要作品。作者以强烈的历史责任感进行写作,希望通过“四人帮”兴亡史的深刻揭露,批判极左思潮,防止“文革”卷土重来。



人民日报出版社  
《“四人帮”兴亡》

本版图片均由本报资料库提供